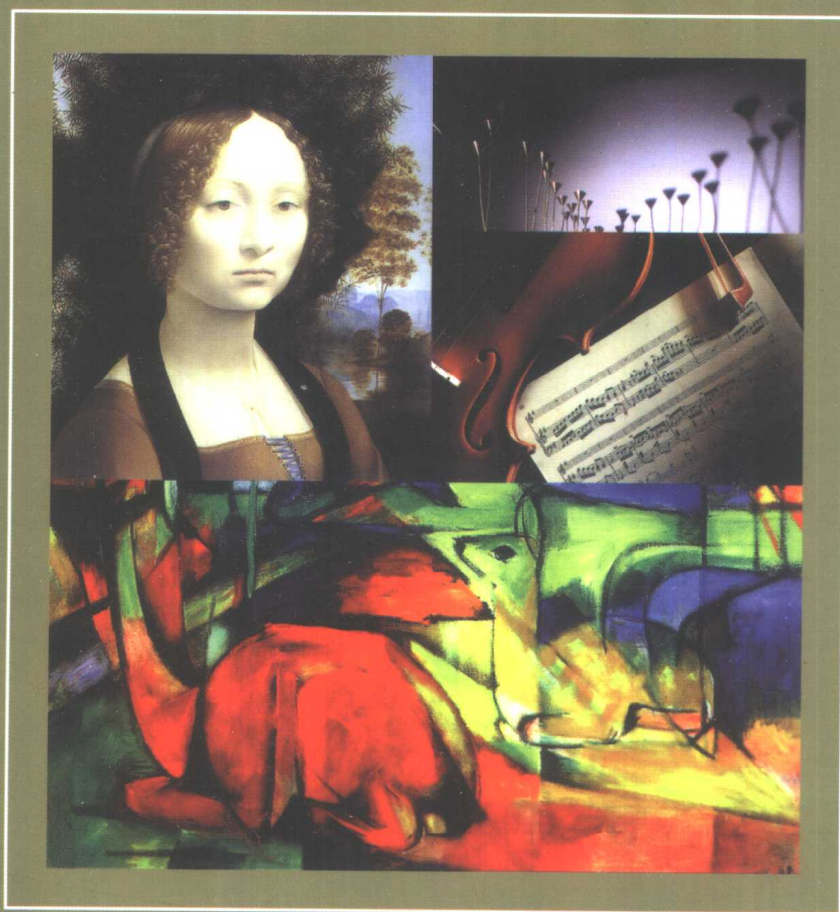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史纲

(第二版)

A BRIEF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蒋承勇 主编



復旦大學出版社

高等院校中文系本科教材

世界文学史纲

(第二版)

主 编 蒋承勇
副主编 项晓敏
赵光育
何仲生

2012/02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史纲/蒋承勇主编. —2版.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7
高校中文系本科外国文学课程教材
ISBN 7-309-03230-6

I. 世… II. 蒋… III. 文学史-世界-高等学校-教材 IV. 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6708 号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642892(编辑部)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复旦大学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32.5
字数	583 千
版次	2002 年 7 月第二版 2002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 000
定价	4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高等院校中文系本科外国文学课程教材,由全国十几所院校资深任课教师合编。全书分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两部分,在叙述东西方文学的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时,紧扣各时期对人的理念这个中心,点面结合、史论结合,条分缕析,追摹几千年来世界文学的发展脉络。既可供教学用,亦可供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参考。

本书编者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生国	王志中	王欣	冯欣	孙靖	何仲生
李莉	杜隽	张建华	沈慧君	陈怡	陈婷婷
罗明洲	周明燕	项晓敏	赵光育	钟伟华	钱奇佳
彭少健	蒋承勇	鲍维娜	潘灵剑		

目 录

西方文学

导 论	3
第一章 古希腊罗马文学	18
第一节 概述	18
第二节 荷马史诗	25
第三节 古希腊戏剧	29
第二章 中世纪文学	36
第一节 概述	36
第二节 但丁	49
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	57
第一节 概述	57
第二节 塞万提斯	67
第三节 莎士比亚	75
第四章 17 世纪古典主义文学	86
第一节 概述	86
第二节 莫里哀	93
第五章 18 世纪启蒙文学	99
第一节 概述	99
第二节 歌德	111
第六章 19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	121

第一节 概述	121
第二节 拜伦	135
第三节 雨果	142
第四节 普希金	150
第七章 19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	157
第一节 概述	157
第二节 司汤达	169
第三节 巴尔扎克	177
第四节 狄更斯	186
第五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	194
第六节 列夫·托尔斯泰	201
第七节 契诃夫	212
第八节 易卜生	218
第九节 马克·吐温	226
第八章 19 世纪自然主义和其他流派	233
第一节 概述	233
第二节 左拉	240
第三节 莫泊桑	246
第四节 波德莱尔	252
第九章 20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上)	260
第一节 概述	260
第二节 高尔基	272
第三节 肖洛霍夫	282
第四节 艾特玛托夫	290
第十章 20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下)	296
第一节 概述	296
第二节 罗曼·罗兰	307
第三节 德莱塞	313
第四节 海明威	319
第五节 劳伦斯	327

第十一章 20 世纪现代主义文学	336
第一节 概述	336
第二节 艾略特	346
第三节 卡夫卡	354
第四节 乔伊斯	363
第五节 萨特	372
第十二章 20 世纪后现代主义文学	381
第一节 概述	381
第二节 贝克特	395
第三节 品钦	401
第四节 海勒	407
第五节 马尔克斯	415
 东 方 文 学	
导 论	427
第十三章 上古东方文学	433
第一节 概述	433
第二节 《旧约》	443
第三节 迦梨陀婆	448
第十四章 中古东方文学	454
第一节 概述	454
第二节 紫式部	465
第三节 《一千零一夜》	471
第十五章 近现代东方文学	478
第一节 概述	478
第二节 泰戈尔	489
第三节 川端康成	496
第四节 大江健三郎	504

西方文学

导 论

文学是人学,文学艺术的每一个毛孔都透射着人性的光辉。

对人的自我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探究,是西方文化的传统,也是西方文化演变的内在动因,也决定了西方文学自始至终回荡着人对自我灵魂的拷问之声。贯穿着深沉而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人文精神的西方文学也因此显示出深厚的人性意蕴和文化内涵。

—

古希腊文学是欧洲文学的源头之一,其中所蕴含的关于“人”的思想观念,经由古罗马文学的传承,对后来的欧洲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瑞典古希腊罗马研究专家安·邦纳认为:“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在希腊文明的观念中,人和世界都是对另一方面的反映,都是摆在彼此对立面的、相互照应的镜子。”^①古希腊民族对“人”的重视,与该民族的自然观、宇宙观有密切联系。古希腊人一同自然分离后,就产生了强烈的个体意识,作为主体的人就处在高于自然与社会的位置上,主张人对自然与社会的征服和改造,主体与客体呈分立态势。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约前480—前408)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就是希腊人强烈的自我意识的表露。重视个体的人的价值的

^① 转引自〔苏〕鲍·季格里扬:《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8—29页。

实现,强调人在自己的对立物——自然与社会——面前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人智),是古希腊文化的本质特征。在这种文化土壤中产生的古希腊文学,就呈现出张扬个性、放纵原欲、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的特征,具有根深蒂固的世俗人本意识。古希腊神话是原始初民的自由意志、自我意识和原始欲望的象征性表述。在神话中,神的意志就是人的意志,神的情欲就是人的情欲,神就是人自己;神和英雄们为所欲为、恣肆放纵的行为模式,代表了古希腊人对自身原始欲望充分实现的潜在冲动,体现了个体本位的文化价值观念。荷马史诗中英雄们对荣誉的崇尚,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执著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稍晚一些时候的古希腊悲剧中,英雄们总是因“命运”之重负而深感行动的艰难,但又从不放弃行动的权利,敢于反抗“命运”的捉弄。这种困兽犹斗的抗争,体现出了个体生命的无穷追求与“命运”的不断惩罚之间的矛盾构成的悲剧意识。悲剧时期的古希腊人的自我意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文学对人性的掘进也就进入了新的阶段。总之,古希腊文学中体现的世俗人本意识是原欲型的,虽然其中也不乏理性精神,但这种精神主要体现为对人的肯定上,而不是与原欲相对意义上的理性意识和道德规范。

古罗马文学是对古希腊文学的直接继承,古希腊文学中的人本意识在古罗马文学中得到了再现,并经由古罗马文学广泛地传播到后世的欧洲文学与文化中。不过,古罗马人自身独特的文化性格,又使他们的文学带有自己的独特性。古罗马人崇尚文治武功,对人的力量的崇拜常常表现为对政治与军事方面辉煌业绩的追求,由此又演化出对集权国家和个体自我牺牲精神的崇拜。因而,古罗马文学比古希腊文学更富有理性意识和责任观念,在审美品格上更趋向于庄严和崇高的风格。但是,古罗马文学人文观念的主体依然是古希腊文学的人本意识,仍属于古希腊原欲型文化的范畴。

希伯来文学是欧洲文学的又一源头,其中所蕴含的“人”的观念,经由中世纪基督教文学对后来的欧洲文学产生深远影响。

希伯来民族信仰一神的上帝,认为世间的万物是上帝创造的。这种宗教自然观、宇宙观直接影响着希伯来民族关于“人”的观念。他们强调人对上帝的绝对服从;尊重灵魂,主张人的理智抑制肉体的欲望;轻视人的现世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看重来世天国的幸福。显然,希伯来文化是一种重灵魂、重群体、重来世的理性型文化。从“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角度看,理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中相对于原欲而存在的又一层面;原欲与理性是人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因此,古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属于异质文化,它们各自蕴含着人性中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侧面,因而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是

既对立又统一,既矛盾、冲突又互补、相融的。在公元1世纪中叶到2世纪末叶“希腊化”时期,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出现了第一次碰撞,希伯来文化吸收了古希腊文化的某些成分后,演变成一种新形态的文化——基督教文化。当然,此时古希腊文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希伯来文化,因而,基督教文化是以希伯来文化精神为主体的,它依然属于希腊的异质文化。

基督教文学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它的人文观念自然大大有别于古希腊罗马文学,其中蕴含的是一种理性化的人本意识,或者说是一种宗教人本意识。基督教文学中的英雄,不像古希腊文学那样是人化了的神,而是神化了的人。他们往往因神性的附着才显得威力无穷,而不是因人智的充分显现才显得神通广大;人的欲望被来自于神的那种理性制约着,他们的形象虽显示出了神的崇高,却缺少人的灵性与生机,使人性变得苍白与贫乏。如《圣经》中摩西的形象,其丰功伟绩的建立,俨然是上帝的神力在他身上的显现,是人向神的飞升,而不是神向人的还原。基督教文学中人让位于神,“灵”取代“肉”的现象,表现了人对上帝的崇拜。上帝是人创造的,它的神性实质上是人的理性意志的体现,因而,原初意义上的上帝便是人的理性本质的升华。在这种意义上,基督教文学中表现的人对上帝的崇拜,一方面表现出人们对人性本质的追寻趋向于理性的和精神的境界,这是人对自身理解上的一种进步与升华;另一方面又表现了人们对人的原始生命力和个体生命价值的一种压制,是人的主体性的一种萎缩,是对欧洲古典文学中的世俗人本意识的一种排斥。此外,《圣经》中的英雄身上更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和对民族、群体的责任观念,这种精神与观念又进一步升华为博爱主义和世界主义,这是宗教人本意识的又一种体现。总之,重视人的精神、理性本质的追求,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是早期希伯来文学和中世纪基督教文学文化价值观念的主要特征。这种尊重理性、群体本位、崇尚自我牺牲和忍让、博爱的宗教人本意识,是以后欧洲文学与文化内核的又一层面。

当然,当世俗教会把基督教精神推向极端之后,上帝就成了人的异己力量。这种情形在欧洲中世纪后期表现得特别明显。随着上帝权力的畸形膨胀,人完全成了上帝的奴仆,人的主体性在上帝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此时,基督教沉重的十字架使人与自我本质分离,作为“有情欲的存在物”和“能动的自然存在物”的人,其生命的本能冲动、个性的合理要求、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都被基督教教义视为罪恶的和无意义的,人性遭到了严重的压抑。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的人本意识已蜕变为神本意识,原始基督教对人性本质的理性追求最终走向了对人性的扼杀,基督教也就走向了人性的反动。于是,对新的文化模式的追寻就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

文艺复兴是欧洲文化的大转型时期,人们对宇宙、社会和自我的认识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这一时期,欧洲文化的古希腊罗马源流与希伯来基督教源流形成了比“希腊化”时期更大规模的矛盾、冲突与互补、融合,从而带来了文学中人文观念的重大变化。

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文化走向极端,成为人性的反动,成为人的异己力量,一些人文主义者就借用古典文化向它发起了攻击,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文化于是形成冲撞之势。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它的以人为本、以人权反神权、以人性反神性、以个性自由反禁欲主义等思想,是和基督教的文化内核相冲突的。以人为本和以神为本,是文艺复兴运动中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冲突的焦点。以人为本,归根结底是要求以人性、人智取代神性、神智,从上帝那里找回人的价值,人的主体性,也即人自己,因而,这种冲突实质上也就是原欲与理性、肉体与灵魂的冲突。人文主义思想是以古希腊的世俗人本意识为主体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对基督教文化思想的胜利,也就意味着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胜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艺复兴是一个文化转型时期,它将一度极端化了的人、神关系,也即原欲与理性、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作了调整,从而有了“人”的觉醒与解放。当然,文艺复兴运动中既有两种文化的对立与冲突的一面,也有融合与互补的一面,因而,人文主义决不只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单一性延续与继承,更不是简单的重复,它同时又吸收了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原始基督教和《圣经》本身所倡导的仁爱、忍让、宽恕等博爱思想,体现的是宗教人本意识,它与中世纪教会宣扬的教义不能同日而语。这种思想在本质上也体现了:对作为上帝创造之物的人的个体的尊重与爱护,因而,它与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虽然并非同出一源,却殊途同归,都是出于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维护。这正是两种异质文化融合的契合点。希伯来文化—基督教的这种博爱精神为人文主义所汲取,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中也就拥有了人人平等、仁慈宽恕等基督教观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人文主义又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结合的产物。文艺复兴运动便是历史为欧洲社会创造的重新选择文化模式的契机。

人文主义文学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的主流,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

的人文主义文学中所蕴含的人文观念,正是这一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在文学中的不同形态的表现。薄伽丘的《十日谈》把人的原欲作为天然合理的东西加以描写,让人们去追求现世生活的无穷欢乐,表现出“人”的回归与主体意识的觉醒。拉伯雷的《巨人传》中,“巨人”的形象表明了人与神的易位,人取代了上帝,人智的力量是无穷的。小说中“尔所欲为”的名言虽不无偏激,但表达了从宗教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人对自由的热切向往。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中,堂吉珂德先生的追求意识,表达了觉醒的人们要求找回中世纪被压抑了的自由天性和人格力量的强烈渴望。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化和艺术的集大成者,他对人的理解的深刻性要远远超过前辈人文主义作家。他早期的喜剧和历史剧,主要表现个性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这和欧洲早期人文主义作家的思想是基本相似的。他的悲剧则表现出文艺复兴晚期欧洲人的迷惘与困惑,更明显地反映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莎士比亚对人的理解的深刻之处在于,他通过悲剧告诉人们:人的自由是有限的,仅有人欲的解放和满足,并不能把人引向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人性也不仅仅体现在原欲上,而且还体现在其理性力量上,因此,人必须在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原欲与理性、出世与入世、个体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作出准确的把握。哈姆莱特的犹豫、延宕、忧郁,正是当时人们面对这多重矛盾时两难心态的艺术化的表现。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刚刚从宗教的重压下站立起来的“人”,在精神上依然存在着与上帝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世俗人本意识和宗教人本意识在他身上的融合表现得十分明显,这正是近代欧洲文化模式的典型形态。

17世纪的欧洲讲究理性与秩序,这种时代精神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古典主义文学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从而也带来了文学中人文观念的演变。文艺复兴运动一方面带来了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对个性自由的片面追求,也成为造成人的道德水准下降和社会混乱的重要原因。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西欧一些国家相继爆发内战和宗教战争,一度混乱的社会现实使人们意识到理性、秩序的重要性。也就在这个时期,牛顿、哥白尼、莱布尼兹等人的自然科学成果,告诉人们宇宙是井然有序的,因而,社会也应有自己的规范与秩序,个体的人的自由必须合乎或服从于社会规范,而不是一味地“尔所欲为”。哲学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把人的自我意识、人的思维和理性作为人的本体来看待,鼓吹理性至上。在这种精神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古典主义文学,便以理性作为自己的生命。这种“理性”除了特定的政治内容外,主要指人的思维能力和人的理智,它相对于中世纪的宗教理性,更注重人的主体意识和人的能动性,而否定了神性,这是对宗

教蒙昧主义的进一步否定；相对于人文主义思想，则更注重人的理智对情感欲望的制约，强调了对自由的理性规范，这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个性自由的极端现象的反拨。在这种理性主义原则指导下，古典主义文学中的“人”通常都处于理智与情感、个人欲望与国家 and 民族利益的矛盾纠葛之中，并最终让理智战胜情感、让个人欲望服从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服从王权则被奉为最高的理性。古典主义文学中蕴含的是一种理智化了的人本意识，它既肯定人的自我意志和主体精神，又强调理智对自我的约束。因而，古典主义文学中的“人”比人文主义文学中的“人”更疏远了与上帝的联系，也显得更理智、冷静和成熟，但又缺少热情、更少自由意识和生命意识。

18世纪启蒙文学也和古典主义文学一样强调理性精神，但启蒙文学的“理性”在肯定笛卡尔所讲的理性精神外，又从自然法则的高度，强调人与人之间平等自由的社会法则，肯定人的自我情感的天然合理性。这既是对中世纪宗教神性的更彻底的否定，又是对否定情感自由的古典主义理性精神的一种调节与反拨。启蒙文学家大多都把个性与情感自由强调到了高于理性与秩序的程度。卢梭是启蒙文学中崇尚个性自由、情感自由的典型，他否定了基督教的原罪说，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和美的，因而一切发自自然人性的欲望与要求都是合理的，而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却是人性的污染物和罪恶的孳生地。他的《忏悔录》彻底剥开了包裹在人性外面的宗教的和传统道德的遮羞布，还其自然纯真的本来面目，说明了真正值得人崇拜的是人自己而不是上帝。他的《新爱洛绮丝》则是一曲心灵自由与情感自由惨遭厄运的悲歌，是对自然人性的热烈呼唤。卢梭创作中表现的新的“人”的观念，比人文主义文学更具有反宗教的彻底性，比古典主义文学更具有情感自由的欲望和生命意识。但卢梭对人的理解毕竟是理想化、超时代的，歌德则比他更现实、更理智。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寻找着情感与理性统一，寻找着既张扬人的主体精神又不与外在客体冲突、既满足个人欲望又不违背社会道德律令的两全其美的道路。歌德的思考与莎士比亚有相似之处。然而，正如歌德同时代的康德所验证的那样，人的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之间处于二律背反的永恒矛盾之中，因而，人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浮士德一生执著地探索与追求，表现了他对个性自由与实现生命价值的乐观精神，但最终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这正是歌德关于“人”的理解与认识的困惑。但歌德通过浮士德的描写，把“人”的问题的探索推向了更渺远的天地。启蒙文学对个性自由、情感自由的理性追求，为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

二

浪漫主义流行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封建制度衰亡、资本主义上升这样一个新旧历史交替的时代,其文化价值观点总体上属于近代人文主义范畴,但已孕育了现代文化的基因。浪漫主义文学强调自我,追求自由,它是在反古典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古典主义强调理性和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个性自由的反拨,而浪漫主义则竭力倡导自由思想,是人文主义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现”。

浪漫主义的自由思想是和法国大革命的精神相吻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法国大革命的自由精神在文学上的表现,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但是,这种自由精神是由 18 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倡导出来的。卢梭认为,人性本善,而人类文明的发展使人性受到污染;人是生而自由的,而人自己创造的文明却束缚了自己。卢梭的这种思想当时对鼓舞人们反基督教文明,推翻扼杀人性的封建制度起了巨大的作用。法国大革命过去了,原先人们以为会给人带来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然而,现实让人感受到的是资本主义文明使人的生命力受到压抑,使自由得而复失,或者说,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然而,此时卢梭的自由思想早已在大革命的浪潮中深入人心,因此,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人们追求自由的热情依然十分强烈,因而“自由”是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欧洲时代精神的最强音。浪漫主义文学的自我意识和自由观念,正是这种时代精神的艺术形式的表述,卢梭则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精神之父”。浪漫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独立的、无所归依的“自由漂泊的”^① 知识分子,他们处在“自由”的生存位置上,精神视野较为广阔,对现实社会中残余的封建势力和封建意识不满,又不接受限制个性自由的资本主义文明。他们觉得现代文明使人丧失心灵、情感的自由,人性遭到异化,人的生命力受到了压抑。他们认为人类应该有更好的生存方式。那就是更多地保留了人的自然本性,更富有自由感的生存方式,而未经文明染指的原始的和自然的境界是最能体现自由理想、最符合人性的,因此,浪漫主义者崇尚自然,倡导“回归自然”。他们有的留恋湖光山色,有的向往原始森林,有的追怀宗法式的田园生活,

① “自由漂泊”是知识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对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定义。